

人文亚洲

金惠媛



丈夫做家务有助生育率

在只有一个小孩的夫妻当中，丈夫每周多花一个小时做家务，夫妻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可能性就提高一个百分点。

如何提高生育率，一直是亚洲发达国家的政府共同面对的棘手挑战。

让人意外的是，在发达国家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越高，生育率也越高。这一似乎反常的现象，能够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亚洲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问题，并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启示？

2015年，新加坡、香港及韩国的总生育率（即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）只有1.2，日本稍高，但也仅有1.5，均为世界最低。正因为这些国家及地区的生育率极低，它们的人口老龄化也要比其他国家来得快。比较各经济体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，从7%增加到14%所需时间，法国、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用了115年、73年、和69年；而新加坡、韩国、台湾和香港将分别只用了17年、19年、25年和32年。

为了提高生育率和应对老龄化，亚洲发达经济体需要让女性能够调和工作与家庭职责之间的冲突。这些经济体的父权家庭规范，导致包括育儿、扶老及家务在内的家庭职责重担，几乎全部落在了女性的肩膀上。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一度导致生育率下降，这个现象被称为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。然而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，这两者之间却从负向关系变成了正向关系。这一变化被Goldschieder、Bernhardt和Lappegard在2015年称之为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，凸显了男性积极承担家庭职责的重要性。

我对韩国所做的研究，和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永瀬伸子教授，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Mary Brinton教授共同对日本所做的研究，

都支持该假说。研究发现，在只有一个小孩的夫妻当中，丈夫每周多花一个小时做家务，夫妻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可能性就提高一个百分点。

然而，在亚洲发达国家，男性对家务劳动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，不管是相对于他们妻子的贡献，还是以家务劳动的小时数来计算。在所有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国家中，日本和韩国夫妻之间的家务劳动分工是最不平等的。它们也是仅有的亚洲成员国；而在其他非OECD的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新加坡和香港，虽然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，但情况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到，在新加坡和香港，外籍家佣分担了部分原本加诸于妻子和母亲的家务重担。有学者认为，亚洲国家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持续存在，表明它们还停留在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，所以未能扭转低生育率现象。

如何鼓励亚洲男性更多地分担家庭职责呢？这一地区的性别角色规范之强，恐怕会降低公共宣传的有效性。不妨把注意力集中在加班文化上：2013年，韩国人工作了2163个小时、日本人工作了1734个小时。2011年，非OECD的亚洲社会花了更多时间在工作上：新加坡2287个小时、香港2343个小时、台湾2144个小时。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，这些地区的工作时间长到令人震惊。OECD国家中最短的工作时间是德国的1363个小时，而平均工作时长为1770个小时。在20世纪下半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，集体利益被置于个体福利之上，亚洲发达国家的人们对极长的工

作时间习以为常。这样的工作习惯传给了新一代，继续影响着组织的管理文化。

减少工作时长，可以相应地降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。事实上，工作时间长的男性，花更少时间在家务劳动上，也花更少时间与家人相处。为了改善情况，韩国政府在2004年和2011年间，将法定工作时长从每周44小时减少至每周40小时。男性工作时间的减少，是否表示他们可以为家人做得更多呢？我在一项与都柏林大学Changjun Lee博士和首尔国立大学的Young Kyung Do博士的共同研究项目中，探讨了法定工作周时减少4小时，会如何影响男性员工对不同住父母的照护。我们发现，因为法定工作周时的减少，男性员工每年拜访和看望父母的次数增加了四次，为父母提供衣物等非现金支持的概率，也提高了8.2个百分点。

总之，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高的国家，生育率也更高，这是因为一个对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，让女性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需要。消除加班文化并鼓励男性在家多做贡献，可以提高生育率，也可以增加对老年人的家庭支持。政府通过减少法定工作周时，并严格实施这一法规，可被视为一项应对亚洲快速老龄化挑战的有效政策工具。

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，翻译胡姝博士任职于国大亚洲研究院/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）

（本系列为国大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摘要，由不同专家学者执笔，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刊登）